

新旧文化之间的胡适与黑格尔辩证法

王泽庆

摘要: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胡适,他并不完全否定中国传统,而是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受传统中庸等思想影响外,还与他自觉不自觉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有一定的关系。胡适解决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离不开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他不仅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对西方思想进行扬弃,而且以西方思想为尺子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他对西方思想有选择地吸收,同时激活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有一定的超越,但也有对新旧文化各自的矛盾性认识不深刻之处。

关键词:胡适;黑格尔;辩证法;西方思想;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2-0047-08

作者简介:王泽庆,文学博士,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安徽 合肥 230039)。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胡适,他主张过“全盘西化”,但由此就认为他是传统文化的罪人,彻底否定了传统文化,是没有根据的。胡适接受新思想的同时,非常注重挖掘与西方思想类似或对应的中国传统。但说他完全肯定传统,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是站不住脚的。“胡适对中国人宣传美国文化,对美国人讲中国文化。”^①胡适去世之后,蒋中正作“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实际上,不仅仅是道德伦理领域,在其他文化领域中,胡适的一生都注重新旧思想的交融。胡适思想及其理论来源的复杂性,仍需要学界进一步探讨。我们研究胡适如何处理西方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关系,除了考虑他受传统中庸等

思想影响外^②,也不能忽略他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联系^③。

一、黑格尔辩证法与解决新旧文化冲突的方法论

胡适主张“全盘西化”^④,是基于我们要敢于承认现实,敢于睁开眼睛看世界,看自己,“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⑤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也是一种策略,因为传统惰性太大,即使是全盘西化,也不会抛弃得了传统,他说:“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

① 欧阳哲生:《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个跨文化人的历史命运》,《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

② 参见高全喜《胡适:新旧之“中庸”》, <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4-02-10/094681790.shtml>。

③ 目前许多关于黑格尔哲学在中国接受方面的论文,还没有探讨胡适对黑格尔哲学的接受情况,如张仲民的《黑格尔哲学在清末中国的容受》(《学术月刊》2013年第5期)等。

④ 后来,胡适把“全盘西化”改为“充分世界化”,说:“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所以我现在很诚恳地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见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6月26日。

⑤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5页。

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①虽然胡适的“全盘西化”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但其目的是救我们民族“半死的文化”^②,而不是把传统文化完全摒弃,他深知大多数人的惰性能够保守旧文化。

胡适处理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既保持民族性也充分世界化”^③,并非是用非此即彼的方法。这一点符合黑格尔辩证法思想——有生活阅历的人绝不容许陷于抽象的非此即彼,而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事物中^④。为什么可以这么说?我们知道胡适对世界哲学史的发展是非常熟悉的,他就指出:“无论以中国历史或西洋历史来看,哲学是新旧思想冲突的结果。而我们研究哲学,是要教哲学当成应付冲突的机关。”^⑤胡适思想,是以其哲学思想为根基的。他的思想,也可以说是新旧思想冲突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以新代旧或以旧抵新。如何解决这个冲突?我们先看他导师杜威思想的来源。实验主义大师杜威,曾经是黑格尔的信徒,特别是莫里斯教授的课程把杜威引导到黑格尔那里,使杜威在日后的十几年中成为新黑格尔主义的信徒。虽然他后来摆脱了黑格尔的影响,转向皮尔士、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但是杜威思想的许多方面,还有黑格尔的痕迹。关于黑格尔哲学在自己思想中所占的分量,杜威后来曾表述说:“黑格尔关于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神与人的综合……起着一种巨大的调节和解放的作用。黑格尔关于人类文化、社会制度和艺术的论述,包括种种僵硬的界限的消除,对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他还说:“与黑格尔

的结识在我自己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痕迹。”^⑥黑格尔对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神与人的综合,消除了“僵硬的界限”或截然的对立,无疑是其辩证法思想的体现。

胡适从康乃尔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目的是想摆脱黑格尔唯心论的影响,以学习杜威的实验主义。但是,正如他的导师杜威一样,也有“永远的黑格尔的沉淀”,表现在他的哲学史和方法论上,终其一生^⑦。胡适在著作中多次提到黑格尔(旧译为海智尔, Hegel),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他说:“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但是哲学是最守旧的东西,这六十年来,哲学家所用的‘进化’观念仍旧是海智尔(Hegel)的进化观念,不是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的进化观念。”^⑧胡适推崇的进化观念和史学观念,注重事物的发生、变化,其实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科学化”了^⑨,从唯心层次上升到杜威的经验层次。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不能代替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基于生物学研究基础上的推论;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则不局限于此。胡适对待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冲突,靠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还是要结合黑格尔的辩证法,因为“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⑩。恩格斯也告诫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胡适自己在研究中也运用黑格尔辩证法,他认为庄子名学和人生哲学中有进化论,其依据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变化进化的道德观念和是非观念,有些和德国的海智尔相似。”^⑪我们看看胡适的老师、黑

①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册),第515页。

②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册),第515页。

③ 胡明:《把胡适放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合理坐标上》,《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11日。

④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6页。

⑤ 胡适:《从历史上看哲学是什么》,《国闻周报》第2卷第20期,1925年5月31日。

⑥ [美]简·杜威:《杜威传》,单中惠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63~65页。

⑦ 参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274页。

⑧ 胡适:《实验主义》,《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15日。

⑨ 黑格尔曾这样论述事物的变化:“一切有限之物并不是坚定不移,究竟至极的,而毋宁是变化、消逝的。而有限事物的变化消逝不外是有限事物的辩证法。”见[德]黑格尔:《小逻辑》,第179~180页。

⑩ [德]黑格尔:《小逻辑》,第177页。

⑪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文集》(第6册),第337页。

格尔唯心论代表康乃尔大学克雷登教授所说的——哲学的真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与消极两层意义的批判精神。它敬慎地综合、珍惜历史的传承^①——我们就知道胡适在接受新思想时候,为什么不能舍弃传统文化。就上述胡适与黑格尔的关系而言,我们完全有必要从辩证法的角度阐述胡适的思想,这是阐述它的重要维度。

美国学者勒文森指出,近代知识分子在理智上接受、认同西方现代文明,而在感情上又无法完全割舍中国传统^②。对于传统,胡适不仅仅是出于情感上无法割舍,也有他对黑格尔辩证法自觉不自觉运用的原因,他明确指出:“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③为什么不能直接用新文化直接代替旧文化?黑格尔认为:“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④我们不能只看到旧文化衰亡的因子(其内在矛盾的否定方面),而忽略了它仍有生命力的部分(其内在矛盾的肯定方面)。所以胡适认为,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和前途就是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再生”^⑤。当然,这种“再生”需要现代文明新鲜血液的注入,是在古老文明基体上的“再生”。胡适特别指出其领导者必须谙熟传统与现代历史,“由那些懂得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且试图用新的现代历史批评和探索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遗产的人来领导的”^⑥。只有谙熟传统与现代历史者,才能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使旧文化出现新的活力与生机。

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思想,我们更容易理解

许多传统与创新关系的论述,如库恩认为:“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也必须是个传统主义者,他很乐于用已有规则玩复杂的游戏,以便成为一个可以发现用来玩游戏的新规则和新棋子的成功的革新家。”^⑦众所周知,库恩的论述也适用于人文学科。由此说来,胡适不仅是一位传统主义者,而且是一位发现游戏新规则的革新家。新规则不仅受新思想、新方法的启发和激活,而且受传统的制约和影响。对于新规则,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事物内在矛盾的肯定方面,但它仍有矛盾的否定方面。而对于传统,它也是黑格尔所说的有限之物,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矛盾的否定方面,忽略了矛盾的肯定方面。真正做到创新,在倡导新规则的同时,还需要吸取传统的肯定方面。

胡适认为在中国传统中,能够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合适土壤。“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如果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⑧这种方法避免了外在形式的强加,不仅不致产生陌生感与异己感,而且能够更好地结合传统与现代的肯定方面。这种态度不仅符合儒道精神,也符合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

二、胡适对西方新思想的接受

格里德曾经指出:“在美国作学生的时候,胡适满怀热情欣然接受的,是那些他的早期教育已为他奠定下根柢的思想,而且,他只是吸收了与他到美国之前虽未坚定于心却也显露端倪的观点最为合拍的那些当代西方思想。”^⑨格里德所言是符合实情的,胡适对西方思想的接受的确是有选择性的,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扬弃”。在胡适那里,是根据传统文化对西方思

① 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第280页。

② 参见[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页。

③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第10页。

④ [德]黑格尔:《小逻辑》,第178页。

⑤ 引自[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⑥ 引自[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337页。

⑦ 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

⑧ 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文集》(第6册),第11页。

⑨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44页。

想进行扬弃。当然,这种扬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胡适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思想,更具有普遍性。在胡适的时代,西方思想是层出不穷的,而最让胡适服膺的是人文精神(即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精神(即胡适所谓的“理智主义”),与当时崇尚“民主”与“科学”之风气相一致,主要内容包括西方近世思潮中的进化论、易卜生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等^①,而不是其他的思潮,这是他以是否符合传统文化为标准来选择的。

(一) 对人本主义思想的接受

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导言中指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②后来在一篇演讲中他又将哲学重新下了一个定义:“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给比较可普遍适用的意义。”^③胡适论说的依据,就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他赞同杜威的看法:“如果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了,那时候便是哲学光复的日子到了。”^④胡适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等思想,从哲学上看,都源于此。

人本主义是人文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人文主义传统最重要和始终不变的是在于以人为中心,每个人都有人的尊严,重视思想等^⑤。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是人本主义的,格里德就持这样的看法:“杜威的实用主义也具有如下的特点,即它是人本主义的、具有社会导向的、以起源于进化论的变化观点为基础的,而且主要是

为了这样一种信念服务的,即经验可给人们以洞察其本质的能力,并可通过对原因与效果(或用更典型的实用主义的术语说,前提与推论)的理解,把它转化成富有创造力的意图。”^⑥美国学者宾克莱说:“注意到约翰·杜威是一个个人本主义者,这是至关重要的。”他还说:“读杜威的著作时,谁都会立刻发现这一事实,即杜威的实用主义只有在人本主义的背景下才能行得通。”^⑦

胡适接受杜威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是有《学为人诗》等诗文中反映的儒家理性人本主义传统基础的。特别是《学为人诗》,是胡适小时候接触到的第一部作品,是他父亲亲自编写的:“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凡为人子,以孝为职。善体亲心,能竭其力。守身为大,辱亲是戚。战战兢兢,渊冰日惕。凡为人臣,夙夜靖共。敬事后食,尽瘁鞠躬……”胡传编此诗的目的,主要是让儿子胡适了解“为人之道”,包括人臣、人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道等方面,不外乎是儒家仁礼思想的体现。尽管儒家的人本主义与西方有着诸多不同,但是由于儒家仁爱思想的存在^⑧,才让胡适对西方思想进行了选择,让他推崇杜威的人本主义。

需要说明的是,“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它们都是矛盾的统一体^⑨。胡适根据传统文化对西方思想进行扬弃,其中的“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他熟悉的传

① 参见欧阳哲生《胡适与西方近世思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② 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第163页。

③ 胡适:《哲学与人生》,《东方杂志》第20卷第23期,1923年12月10日。哲学的任务在于研究人生的切要问题,的确是哲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在当时问题重重的中国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胡适将世界本质之类久而未决的问题,一律斥之为“玄学”,不免矫枉过正。

④ 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1923年2月。

⑤ [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33~235页。

⑥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页。

⑦ [美]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8~29页。

⑧ 胡适从小就接触传统文化和传统经典,他曾在《四十自述》中说,他在家乡未到上海求学的时候,就阅读了包括他父亲著作的《学为人诗》《原学》在内的许多经典:《诗经》《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与《礼记》等(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第46~47页)。对传统的关注,胡适在留学时期也不例外。与现在人们的想象不一样,胡适曾对中国学生不知道祖国的文明历史感到痛心,他说:“吾国之学子,有几人能道李杜之诗,左迁之史,韩柳欧苏之文乎?可耻也。”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

⑨ [德]黑格尔:《小逻辑》,第132页。

统文化的肯定方面,而不包括其否定方面。他推崇儒家的仁爱思想,并不代表他就不反对在文化上的“尊孔”“祭孔”。他认为“儿子孝顺父亲,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但他同时却强烈反对盲目而虚伪的孝道^①。所以,胡适文中提及孔子、朱熹等人时,我们不能忽略他考虑问题的辩证思维方式。

(二)对西方科学精神的接受

胡适对科学精神的接受,体现在他倡导所谓的新思潮上。他认为新思潮在根本意义上是一种评判的态度,即敢于怀疑的态度,他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②这种“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态度,体现在各种问题和各种学理上。在认识过程中,怀疑方法就转换成问题概念。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特别点出问题在认识过程中的关键地位^③。相关论述在后来写的几篇文章,如《三论问题与主义》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被一再重复引用,可见其重视程度。

胡适接受西方科学精神,是由儒家怀疑传统作为基础的。胡适指出,从孔子、王充到朱熹,再到顾炎武、钱大昕等人,在这个儒家传统里,有一种很可注意的特点,那就是“有意奖励独立思想,鼓励怀疑”^④。例如,程颐和朱熹等人提倡“大胆的疑古,小心的考证”,就是一种

“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⑤。特别要指出的是,程朱理学既有摧残人性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信条,也有值得肯定的怀疑精神,胡适显然是站在程朱理学的肯定方面去对接西方科学精神。他曾赞叹:“以怀疑态度研究一切:实事求是,莫作调人。这就是那些中国思想家的精神,他们曾使中国理智自由的火炬,永远不息。”^⑥从这一论述中可看出,儒家的怀疑传统,为胡适接受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提供了传统依据。

如何找到引进西方现代思想的传统基础,一直是胡适关心的问题,他曾提出:“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⑦胡适关注的,实际上就是用传统文化矛盾的肯定方面支撑欧美新思想。这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鲁迅先生思考新文化的重构时,也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观点^⑧。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文化,这两者并不矛盾,是符合黑格尔辩证法的。

一直到晚年,胡适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化保留着它所特有的“中国根底”,即“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⑨,再次表明他是以此接受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精神的。

三、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一)评判中国传统的标准

黑格尔认为:“一切有限之物并不是坚定

① 参见欧阳哲生《胡适对传统人生观的批判》,《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②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③ 胡适说:“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药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见胡适《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④ 胡适:《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胡适文集》(第12册),第402页。

⑤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集》(第3册),第195页。

⑥ 胡适:《中国思想史纲要》,《胡适文集》(第10册),第419页。

⑦ 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文集》(第6册),第10页。

⑧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页。

⑨ 胡适说:“我相信‘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的传统,并未被毁灭,且在所有情况下不能被毁灭。”见胡适《“中美学术合作会议”昨天在美西雅图开幕》,台北《中央日报》,1960年7月12日。

不移,究竟至极的,而毋宁是变化、消逝的。而有限事物的变化消逝不外是有限事物的辩证法。有限事物,本来意他物为其自身,由于内在的矛盾而被迫超出当下的存在,因而转化到它的反面。”^①传统文化经过千年的演变,由于自身的惰性,必然会走到它的反面。为此,我们需要抛弃传统文化自身矛盾的否定方面,去凸显它的肯定方面。如何找出肯定方面,胡适是以西方新思想为参照。他给传统融入了新的血液、新的思想,让西方新思想给传统中比较进步的一面以合法的基础,给人们以信心。尽管胡适在中国传统中找到引进西方现代思想的基础,但是现代性与传统在彼此融合过程中是互相制约的,他对传统思想的取舍又是以现代思想为尺度的。即按照西方思想寻找传统文化的肯定方面,而舍弃其否定方面。

李慎之曾将胡适与鲁迅进行了比较,他指出:“鲁迅和胡适的身世背景,其实可以说是差不多的,他们在近代史上初露头角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最大的不同也许在于: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现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残缺的,后来又接受了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而胡适则是在被马克思称做‘天生的现代国家’的美国的留学生,又一贯关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②李慎之认为,胡适与鲁迅的接受新思想的文化背景不同,导致了他们现代化的思想的不同。尽管有点简单化之嫌,但还是有一定的道理。胡适这种文化背景,也直接影响了他如何去评判中国传统文化。

季羨林先生也评价过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他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他对国民党并非一味地顺从。他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着独立性。”^③

季羨林认为,胡适是以实验主义和美国的民主制度作为标准来评价国民党的。实际上,胡适不仅以此来评价党派,也用此来评价传统文化。一般认为,实验主义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产物,美国独立之后,出现诸如竞争、务实、科学等思想观点,为实验主义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同时,达尔文进化论等思想也充实了实验主义的内容。美国民主制度,对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不无进步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胡适将其理想化、美化的一面,因为“每一肯定的存在物,在逐步演变过程中,都要过渡到它的否定物,然后,这个否定物又必然要为新的肯定的结果让路”^④。

实验主义等西方思想这把尺子,胡适不仅用来衡量政治,而且还用来衡量哲学、文学等。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让中国古老的文化重新生长,这一运动有时也叫作“新思想运动”,那是着重于当代西洋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潮流的介绍^⑤,实际上是以新思想来衡量中国古老的文化。

如果没有西方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的现实制度与生活,特别是胡适接触到的美国的一切,即欧阳哲生所说的“美国经验”^⑥,胡适是无法使古老文化进行再生的。美国文明通过学校、教会和基督徒家庭,对胡适产生了广泛影响。有穆德这样的美国人告诉他,受美国教育的地方不限于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等处,更重要的和更基本的还是在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去深入体会。1915年发生了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大游行,约翰·杜威夫妇等人就参加了此次游行,杜威教授还当众演说。胡适业师克雷敦教授曾代表民主党参加辩论。教授们直接参与政事,让胡适刻骨铭心,他就指出:“我可以这样说,由这些集会引起我的兴趣也一直影响了我以后一生的生活。”^⑦

① [德]黑格尔:《小逻辑》,第180页。

② 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载谢永编《胡适还是鲁迅》,北京: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③ 季羨林:《为胡适说几句话》,载谢永编《胡适还是鲁迅》,第106页。

④ [英]鲍桑葵:《美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32页。

⑤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第1册),第339~440页。

⑥ 欧阳哲生:《胡适与西方近世思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⑦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第1册),第207页。

（二）对传统的重新发现与超越

可以说，胡适推崇的传统，是依据西方新思想“发现”或“创造”的。如柏格森就认为，现在除了显示过去被遮蔽的方面之外，还产生过去从未存在过的某些东西，也就是说，现在不仅发现过去，而且创造过去^①。还如浪漫主义的出现，使得古典主义中所包含的浪漫主义充分被人们发现^②。马克思也提出“现时对于过去的逆向规定”的观点，他在《资本论》中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③即使胡适所说的“文艺复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创造，正如卡西尔所说：“历史上的以往文化的每一次‘复兴’都足以证明这一点，任何名副其实的‘复兴’，都不是某种单纯的接受，也不是历史文化的单纯的延伸。”^④所以，胡适对传统的揭示，不是现成的，而是按照现在的标准对过去的一种发现，是一种创造，虽然这种创造与发现也不乏比附的成分。

比如自由主义，胡适后来也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此思想^⑤。在胡适看来，老子、孔子和孟子都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代表的“无为政治”，反对政府干涉人民，让人民自然发展，这与孔子所代表的思想都是自由主义者。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当时提出“有教无类”，可解释为“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没有界限”。这与后来的科举制度，都能说明“教育的平等”。这种意见，可以说是一种自由主义思想的体现。此处的孔子，不能等同于胡适批评孔教时所说的“孔丘”。孟子说

“民为贵，君为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胡适看来，也是一种自由主义精神^⑥。尽管自由主义是一个现代概念，说几千年之前的老子、孔子和孟子是自由主义者未免有些不妥，但是胡适能用新视角挖掘出传统思想中的肯定方面，让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新的作用，从而达到文艺复兴的目的，这是值得称许的。

通过选举对美国民主的透视，通过对美国议会程序的观察和实践，感受到美国政治上的民主精神和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对政治的热情介入，使胡适一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胡适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驻美大使之外，很少参与实际政治，但他始终对政治采取了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兴趣，胡适是想通过思想文化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对胡适来说，这是传统“立德、立功、立言”思想的现代演绎。《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它的最高价值取向是“立德”，最后才是“立言”，但它们之间并不是毫无联系，而是“立言”以“德”和“功”为导向，同时又能促进它们。胡适曾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这里“立德”“立功”和“立言”的浑然一体对胡适是影响至深^⑦。但是这里的“德”“功”“言”已经换了现代内容，已不是儒家那种老套立场。

虽然实验主义等西方新思想并非尽善尽美，但对旧中国的思想启蒙功不可没。这种思想启蒙之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依据它们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肯定方面，彰显其合法性和活力。第二，依据它们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否定方面，并给予批判或改良。胡适

① [法]柏格森：《思想和运动》，引自[匈牙利]阿诺德·豪泽尔：《艺术史的哲学》，陈超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39页。

② 参见姚文放《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③ [德]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2页。

④ [德]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沉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9页。

⑤ 关于自由主义的传统基础，对后代学人很有启示。殷海光一直认为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处于对立紧张的关系，传统中没有自由的因子，但是他的晚年却改变了这一看法：“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自由主义要如何沟通？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如果我的病能好，我要对这问题下一点功夫去研究。”转引自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336页。

⑥ 胡适：《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台湾《新生报》，1949年3月28日。

⑦ 王泽庆：《论胡适的学术与政治关系》，《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就指出了中国传统自由主义的不足,在于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重要性:“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行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①还有,我国古代虽然明白时代变迁,文学也随之发生变迁,但是对文学时代性的认识,只是对文学发展规律性的经验性认识。而胡适主张的文学进化观点,不光是对文学规律的认识,更是以自然科学发展的根基,是实验主义服膺的达尔文进化论在文学领域的应用。这样,文学进化的观点,更多了一份说服力^②。胡适虽然梳理了白话文学史,但是他的“白话”显然超越了中国古代白话。首先他吸取了西方语言系统的语法,这种白话明显有了科学化的要求;其次,“科学”“民主”“理性”“自由”“人权”“哲学”“文化”等词语的出现与使用,大大丰富了现代白话文的词汇。这些词汇所包容的现代思想,又是古代白话所没有的。

四、结 语

胡适是对西方文化进行有选择的吸取,这一特点曾受到罗素的赞扬:“谈到中国现存人物中具有必要的才智者,就我亲自接触到的而论,我愿意举胡适博士为例。他具有广博的学识,充沛的精力,对于致力中国之改革则抱着无畏的热望。他所写的白话文鼓舞着中国进步分子的热情。他故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却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③胡适判断西方文化中的优点,主要是以是否有中国传统的基础为标准,注重它们的普

遍有效性或者说是耿云志所指的“人类文化的同一性”^④。可以说,他寻找西方文化中的肯定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外在的参照物。同理,他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方面,也离不了西方文化的参照物。

胡适的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如在传播新思想的同时,注重新思想接受的传统基础,激活了许多沉睡的传统,并对传统有一定的超越,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传统。但是胡适所倡导的“新文化”,不可避免有浓厚的西方痕迹,在把“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成一个新范畴”方面还做得不够^⑤。真正做到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还待后人去完成。胡适对事物矛盾的认识并不全面深刻,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实际上有三种矛盾: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矛盾,二是西方思想自身的矛盾,三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的矛盾,而他关注的重心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矛盾上。通过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互为参照物,去揭示各自的矛盾,其效用是有限度的,有时不免有简单比附和循环论证之嫌。这也造成了胡适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两者自身矛盾认识不足,如没有注意到文言的审美作用,没有清醒认识到他所认可的西方思想也有不足之处,没有真正做到对进化论、易卜生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等思想的扬弃。究其原因,除了时代的局限性之外,还与胡适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暧昧态度有一定的关系^⑥,他没有更深入地理解与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也没有对其进行合理的改造。

责任编辑:刘 云

① 胡适:《自由主义》,北平《世界日报》,1948年9月5日。

②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第1册),第331页。

③ 引自殷海光《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载谢永编《胡适还是鲁迅》,北京: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④ 耿云志:《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学术探索》2006年第2期。

⑤ 马克思曾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4页。

⑥ 胡适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暧昧态度,主要是因为其“不科学”而用达尔文进化论代替,但实质上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一直到晚年,胡适仍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同于马克思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与天然演进的科学方法是不符合的。”见胡适《杜威哲学》,台北“《中央日报》”,1952年12月4日、9日。